

# 博物馆创新发展与区域文化传承

## ——南通博物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探究

李宗康

不同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导致的历史文化背景差异,从而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存在,构成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圈内建立的博物馆与区域文化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承担着征集、收藏、研究本区域历史文化遗产的职责,以及区域内风土人情、文学艺术等的展示,促进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 区域文化与博物馆

区域文化为博物馆提供文物资源,是开展博物馆各业务的基础。区域文化为博物馆主要提供两种文化存在:一是物质性存在,即具体实物,如陶器、瓷器、玉器、书画等;二是意识性存在,包括制度、精神、道德等,如传统礼仪、社会道德、民间信仰、文学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种文化存在形态即构成博物馆的收藏对象。

博物馆呈现地域文化的缩影。在文物收藏工作中,需注重地方特色文物与标本的征集,尽可能将先辈留下的历史信息收藏,尤其是大众生产生活中形成的文化,如民间技艺、传统风俗、口头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阐释区域文化资源内涵。博物馆研究者需将藏品所传递的信息符号进行解码,将之放入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解读。换言之,博物馆在不断丰富藏品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发掘馆藏文物的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及科学价值,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

文化传播彰显区域特色。博物馆本身即是文化传播媒介,传播的途径应多元化,这主要体现在展览、教育、文化产业等方面。展览是区域文化内涵再现的有效方式,是研究者对馆藏资源进行编码阐释的过程,建构博物馆公众、实物之间对话体系。区域性文化资源为博物馆展览提供熟悉的文化情景要素,博物馆对区域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展示,使公众在欣赏展览时产生共鸣,从而提升观展体验。

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博物馆要以优质资源为载体开发具有生命力的教育活动。如何避免各馆社教活动千篇一律,区域文化为社会教育活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博物馆基于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采取本区域公众接受度高的方式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传递地域文化,让观众深度理解与传承地域文化。

### 南通博物苑公共文化服务实践

构建博物苑区域文化馆藏资源体系。江苏南通处在大陆文化圈与海洋文化圈的交汇点,形成独具特色的江海文化。博物苑在原有旧藏的基础上,以展示南通地方历史文化、传统民俗和自然资源为指导方向征集文物或标本。如南通地方历史文物及环境资源的实物资料,南通地方特色

经济——盐业、棉纺织业等实物、南通名人——李方膺、陈实功、张謇等的相关文物,南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沈绣、蓝印花布、板鹁风筝等,这些最具南通活力的文化元素构成南通博物苑藏品特色。

解读南通区域文化资源内涵。博物苑在对文物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一直重视研究、整理地方史料、民俗和乡土记忆等。博物苑工作人员通过不断挖掘藏品内涵,出版了《南通博物苑文物精华》《南通博物苑藏品选》《南通博物苑文献集》等。此外,还把展览、教育项目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做好文物阐释工作,让公众更好地感受本地区的风土人情。

以江海文化为纲进行文化传播。博物苑基本展陈“江海古韵——南通古代文明陈列”将极具南通地方元素的藏品运用科学和美学手段进行陈列,以实物讲故事的形式展现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质。展览分为江海沧桑、盐棉兴邑、城镇肇基、文苑逸韵等部分,通过叙事的方式,借助科技手段,再现南通先民与自然相互依存和修正的历史轨迹。

展览“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张謇”,通过复原张謇故居陈列(接待大厅、起居室、书房等复原展示)及张謇业绩展,讲述张謇“实业救国”、发展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巨鲸天韵——江海鲸类生物资源专题陈列”采用两层设计,分为一楼“海下”和二楼“陆上”两个部分,通过多媒体等展示手段立体展示江海南通多样的生态物种。“翻开记忆——江海民俗风情展”展示的锄、犁、纺车、织布机等传统农具和刺绣、剪纸、竹编等百工技艺,拉近了公众与博物馆的距离,让公众感受江海农耕文化、江海的民生变化。

创建区域性品牌教育项目。区域性文化是开发博物馆品牌教育项目的源泉。目前,博物馆充分发掘南通区域文化资源,已开展“格物明理”“多识鸟兽之名”和“四季博物馆”等系列活动。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教育方面,博物馆根据不同年龄段增设适合学生特点的教育项目,提高其思维、情感、学习等能力。如“踏波炼海·煮海为盐”——煮盐体验亲子行,以南通地区最早的产业——盐业为背景,结合地方历史陈列中南通盐业的展示,带领学生走出馆舍,以南通启东传统海盐生产现场为课堂,参观古盐场,听老盐民介绍传承百年的板鹁盐工艺流程,实地了解传统盐业工具的使用并体验其部分工艺流程。结合江苏地方史研发的公众考古项目“探古寻源——访江南文明的早期印迹”青少年考古夏令营,带领学员赴考古工地观摩,从调查钻探到探方发掘等,让学生了解文物是如何出土的,使其对考古工作产生直观认知。通过这些社会教育活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了解南通的历史,将南通的传统植根于公众心底,激发他们热爱家乡的情感,从而自发地

传递乡土文化,留住乡愁。

### 博物馆创新发展的着力点

区域文化的研究力。在众多区域文化的历史遗存里,如何识别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文物,还需要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作为智力支撑。提高研究水平,发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保证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因素,对区域文化的研究程度与文物征集工作成效呈正比关系。

博物馆创新发展的智慧力。现代科技高速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博物馆智慧化是大势所趋。博物馆应充分以智慧化模式进行创新管理服务,围绕博物馆功能进行智慧化探索。2018年南通博物苑推出“实景南通博物苑”线上展示与互动体验平台,该项目融合“文、图、音、视频、三维建模”,展示博物馆的基本陈列、文物资源和实景,让公众足不出户游览博物苑。2020年南通博物苑推出“环濠河博物馆群航拍VR展示”,以航拍的VR角度,集中展示环濠河博物馆群联盟单位。建设智慧化博物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文物资源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2021年,南通博物苑“博物馆奇妙夜”主题活动主打直播专场文艺演出(紫藤花又开),结合博物馆建筑和文物背景,通过歌舞、短剧、非遗表演、专题导览等形式,配以多样的舞美设计,打造了一场穿越古今的高规格美学体验活动。其中,为了让博物苑文物活起来,选取与张謇有关或最具江海文化特征的文物,由“志愿宝物守护者”讲述文物的前世今生,辅以当代南通地方原创文艺作品等进行渲染,展示南通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护的成果,充分彰显“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主题。

社会力量的参与力。博物馆不仅要注重其自身内部系统的研究,还要拓宽多渠道与社会力量合作,动员社会力量,深化融合。社会力量可以在志愿者服务、社会教育、陈列展览、文化创意等方面有优秀的表现。志愿者是博物馆里靓丽的风景,是文化推广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服务的良好形式。全国各博物馆已充分认识到志愿者力量的重要性,定期向社会招聘志愿者。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志愿服务的项目也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讲解,还延伸至策划设计、教育活动、资料整理等方面。社会力量的文物意识正在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社会参与已是博物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的有效力量。

博物馆是区域文化物质形态的收藏者,更是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区域文化的关系相辅相成。博物馆需重视地域文化元素,在收藏、展览、教育等方面,增强研究力、提高智慧力、加强社会参与度,建设特色博物馆,构建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区域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 正定隆兴寺转轮经藏的元代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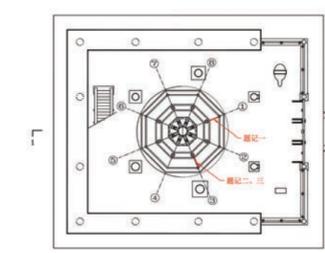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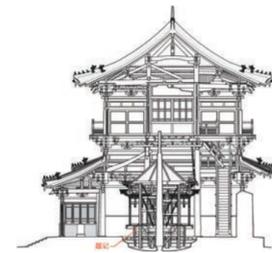


图1



图3

河北正定隆兴寺内的转轮经藏是海内外知名的小木作珍品,与转轮藏殿一起始造于北宋,20世纪经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刘敦楨诸先生测绘调查。经藏的很多细部手法与《营造法式》以及宋元时期的建筑风格符合,向来为学界所关注。

最近我们在联合进行的隆兴寺文物建筑调查工作中,对转轮经藏又进行了详细的勘察,在帐身坐以下较为隐蔽的结构部分,发现了一些历史上的墨书题记。在此把其中时代较早的几种元代题记略作介绍。

最明显的元代题记分布在两个位置,都在柱下的横梁和木方的表面。(图1)

第一处是在①号柱的下方,即进殿面对经藏时的右手位置。竖书共三行,右起第一行“至正廿五年二月十九日”10个字。(图2)

第二处是在③号柱下,包括比邻的两次题记,而且年份似乎都是元至正二十五年。

题于下方的一则,日期是八月初三,字数较多,共八行,行书。其中右五行是一首《鹊桥仙·青山无数》,全阙近60字,可辨识者尚多,第五行是“鹊桥仙”三字。左三行的字略小,左一行是“至正廿五年八月初三日……”,二、三行应是人名、乡里。

题于上方的一则,字数较少,共四行、20余字,书写略显粗糙,不似下方文字用笔之纯熟。数字兼跨上下两根木构件,表明目前的构造仍是元代以前的组合。第一行“同佛”二字较大,第二行未有“到真定”三字,第三、四行有“至正廿五年”及“九日十二月”等字样。(图3)

以上两处共三则题记,看来都是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游人题记,文字与书法当以八月初三日所题《鹊桥仙》最富意趣。这首词在元代流传很广,后又辑入《警世通言》话本故事

中,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此处所写的,和从前所知的几种版本颇有异同,是理解元代词曲文学传播的珍贵史料。而二月十九日的题记,虽然文字不多,但书风稳健,结字似赵孟頫的行书,时代气息浓郁。

另外,其他柱下的类似位置还有一些墨书,很像兰札体梵字。

隆兴寺夙为宋元以来的华北名刹,尤其是蒙元时期,大规模的修缮和供养屡见于碑碣,惟于元末则付阙如,反观这几则题记的书写,恰好都发生在这一时代而且是同一年(至正二十五年),或许不是偶然的。它们连同其他时代的多种书迹,都位于经藏最下部的梁枋和垂柱等木结构表面,这些部位掩藏在帐身坐面板以下,平时隐蔽昏暗,现在也需要走下转轮经藏所在的圆形坑内方可观察。在历史上经藏外围有护栏、挡板装饰和围护,瞻礼游客很难随意上下、题词记行。因此,这几处题记表明至少在转轮藏殿内,当时已疏于僧团的管理了。而且,很可能在此之前,勾栏挡板等就已残破缺失,所以游人才可以从空隙步入坑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动荡,营造学社诸公来调查隆兴寺的古代遗珍时,目睹了转轮经藏当时的残破。

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至正二十五年时转轮藏正在维修,书者在施工的间隙得以入内探毫。

20世纪五十年代正定古建筑维修期间,文整会负责转轮藏修缮工程的余鸣谦先生曾提及这几则题记,惜未详述。我们的调查也是在余先生当年工作的基础之上,顺着前辈70年前提到的线索稍作补充。

(调查:房树辉、孙荣芬、丁荃、顾心怡、党晟、李桃等;执笔:丁荃、房树辉、顾心怡)

# 山东石窟寺风化损伤特征及保护建议

薛萍萍

山东省是我国华东地区石窟寺第一大省,也是全真教石窟寺艺术的发源地和集大成地区,现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183处,在全国石窟寺文化遗产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山东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风化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已经产生了一些危岩体。

### 山东省石窟寺风化损伤的主要模式

按照石窟寺岩体风化损伤的不同表现,大体可分为:石窟寺岩体不同尺度的失稳问题,以及由于微环境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类型的风化问题两大类。失稳问题,指的是石窟寺的岩体因多种原因出现不稳定或危险性结构。风化问题,指的是文物表面细微处(通常是厘米甚至毫米厚度)受外界环境影响产生的外观损伤和破坏。

不同尺度的失稳问题。一是岩体边坡失稳。历史上,石窟寺大多开凿于陡倾顺层岩层,岩体开凿后,由于其内部应力调整、变形增大,所以开挖过程中容易在岩质边坡产生卸荷损伤带,从而导其上部岩体发生或大或小的塌落,最终形成程度不同的开挖损伤地带,造成较大规模的坡面塌陷和位移。二是顶板失稳。实际上,针对古建筑由岩体蠕变特性的极慢位移所引起的失稳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伴随着岩体蠕变时间的逐步积累,岩体可能会受拉加快,导致微裂隙持续扩展,造成拉裂速度逐渐加快,再加上不可避免受到季节周期性温度、湿度变化的影响,引起岩石的热膨胀,加剧蠕变位移,使得损伤慢慢加大,直至顶板表面失稳脱离。三是危岩体。石窟寺在开挖凿刻的过程中形成大量的临空危岩体。由于不同山体、岩体的地质、地形和结构的区别,受到雨水、大风、地震等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以及两种因素的叠加,导致部分岩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不同类型的风化问题。岩石在风化过程中,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文物损伤过程和机理变得十分复杂。一是水——岩相互作用。液体与矿物之间的反应,在时间的累积下造成山石内部本体结构的化学变化。另外,盐结晶、可溶盐也在或干或湿、或热或冷的反复性、循环性环境变化中,进一步加快、加大对其本体强度和内部结构的破坏。二是节理裂隙风化破坏。石窟寺的岩体大多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地质作用,因此受各种地质界面(节理、层理、构造裂隙、卸荷裂隙)的影响非常明显,使得岩体的物理特性及其与周边山体的支撑作用逐步发生改变。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作为文物载体的山体岩石成为威胁文物安全的重要因素。三是生物风化损伤。微生物对石质文物变形破坏以及维护保护有着重要的影响。植物在其生长过程中,吸取石质内部的水分及微量元素,其根系也会扎进石质内部,而苔藓、地衣等植株腐

败后产生的植物酸更会对石质文物本体产生不可逆的破坏作用。

### 石窟寺病害原因分析

山东省典型石窟寺的病害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所在岩体的风化作用、风蚀作用;雨水面流的冲刷作用、岩层渗水的溶蚀作用、冬季冰雪的冻融作用;酸雨形成的强烈侵蚀作用;岩体中发育的节理裂隙和卸荷裂隙、裸露地层石的构成及其物理性学性质等。其中,造像所在岩体和造像岩石的风化作用,与其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特别是降雨、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因素紧密关联,表现为较为复杂的连带作用;而不同岩石之间的差异性风化,又与岩石本身的构成及其物理性学性质有关,岩体中发育分布的各种节理裂隙和卸荷裂隙会单独或共同地发挥作用,容易使得石窟、造像或其所在的载体形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危岩体,这种变形失稳,在时间流逝之外,会逐步危及石窟及摩崖造像本体的安全;另外,大气降水渗入控制着危岩体稳定性的节理裂隙和卸荷裂隙,发生的各种变化也致使危岩体日益失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因素:一是环境地质因素。岩石本身既是文物的载体,也是病害的载体。按照岩石的类别划分,山东省石窟寺(含摩崖造像)的岩性以石灰岩居多,其次为花岗岩,还有少量砂岩。不同的结构和性质,导致不同的病害诱因。灰岩、白云质大理岩等沉积变质岩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岩溶作用特性,形成溶蚀、沉积、钙化,导致造像表面模糊、面目全非;花岗岩一般抗风化能力较强,但其特有的球状风化会导致危岩体的产生,威胁本体的安全;砂岩孔隙度大导致风化为粉末状或片状剥落,结构疏松,蒙脱石相对含量较高,易吸水膨胀,所以粉状、片状风化病害尤为严重,后期风化会导致岩体破裂,造成龟裂、残损缺失。无论是鲁中山区丘陵还是胶东丘陵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长期地质变化使得岩体整体性和强度发生改变,水、盐、风等外部因素又与山体本身的节理裂隙共同作用,造成了自然演进过程中的陆陆续续损害。

二是地理气候、气象因素。鲁中南山区丘陵一带,由于日夜温差较大,造像表面的温度、湿度升降幅度也随之较大,造成表层岩体结构松散,形成崩解破碎,乃至片状、粉状剥落。胶东丘陵一带,山东半岛受海洋影响较强,高温、低蒸发,以及氧化、风化、生物等较活跃;同时,该地区又是多风地带,风力较强,因风沙流导致的强烈风蚀剥蚀,最终形成风蚀孔洞。

三是水文特征因素。大气降水、河流、地下水等水文因素的危险性主要表现为:冲刷、剥蚀岩体及雕像表面,加速岩石风化,如济南千佛崖摩崖造像,面流水及岩层渗水严重造成造像本体的片状

剥落;水的渗透及湿度变化强化了相关病害,如济南莲花洞石窟大量壁画的脱落;水位升降形成的侵蚀产生边坡失稳,如济南北玉潭寺下层摩崖造像的崩塌、灭失等;对石窟造像的缓慢溶蚀作用,如济南龙洞造像表面分布有钙化或成岩沉积,导致造像模糊不清。

四是新构造运动与地震因素。从宏观上看,山东省新世至第四纪新构造运动的特点是以垂直运动为主,主要表现为胶东地区的大面积上升,以及沂沭河平原及胶莱平原带的下降。另外,这里属于地震多发地区,东部是南黄海地震区,西部是聊考断裂带,北部是渤海——威海断裂带,中部则是郯庐断裂带,历史上和现实中都存在发生中强以上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

### 石窟寺保护建议

一是加大抢救性保护力度,实施加固修缮工程。制定有针对性、时效性的治理方案,有序并快速推进石窟寺本体及其载体的抢险加固治理。同时,根据岩体的特殊性开展精准防治,防患于未然,变被动为主动,加强前瞻性预防保护措施论证和实施,提升石窟寺预防性研究和保护能力。

二是坚持考古先行,将考古调查和历史研究、艺术研究相结合,增强连带效应。调查中发现,有些石窟的题记碑刻风化严重,受酸雨等因素影响,一些碑刻损坏程度愈加严重,亟需进行拓印和辨识,开展铭题题刻等文献研究,梳理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审美信息,并利用多学科技术手段和研究视角对考古成果进行阐释,提升文物科研能力,为石窟全面断代提供证据。

三是深化学术研究及其文化价值挖掘,建立专门机构,培养稳定的、学科配备合理的科研队伍,承担山东省内的石窟寺保护监测、考古研究、资料整理等工作,统筹协调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规划申报系列主动性石窟科研课题,开展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模式,建立完善的石窟寺考古学研究体系。

四是加强石窟寺数字化保护利用。启动石窟寺3D扫描,尽量采集全面的基础数据。利用互联网和新技术,探索发展数字文化大众化实体体验空间。加强科技合作,助力石窟保护,提升石窟寺综合展示水平。

五是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文物保护一定要依靠科技”,“运用先进技术加强文物保护和研究”。在各省、各地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布局建设相关领域跨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发挥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作用,使得全国上下形成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取长补短的“一盘棋”局面,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现代科技融合创新,以科技助力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与大众化。

# 晋儒的复古:山东巨野前贺庄画像石墓

郭郑瑞



2005年巨野县文物管理所抢救性清理前贺庄画像石墓现场(原巨野县文物管理所摄)

近期刊布的山东巨野前贺庄画像石墓是一座利用汉画像石修建的西晋墓,将原属于不同墓葬或祠堂的画像石拼成一座完整的新墓需要精密的谋划,铲磨石面原画之后新刻画像更费周章,是什么原因驱使晋人这样做?作为简报的整理者,笔者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西晋时期,墓葬画像在中原地区始终处于衰微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建造者却不满足于(仅仅)拼砌东汉画像石,而是大力改造了一番中室:铲磨了中室南、北壁横梁的石面,加深了双龙穿壁与卷浪纹;磨平了东、西壁与南北横梁等高的石面上原有的平行凿纹;铲磨了中室四个角方柱的柱面,东南柱新刻一男子、两鸟(似模仿汉画中的凤鸟衔丹)、一铺首衔环,西南柱新刻一男子、一铺首衔环,西北柱新刻一男子、三棵树与一小人(似模仿汉画中的树下弋射),东北柱加深了卷浪纹。

中室新刻画像中,三男子占据了主要位置,使人联想到东汉硕儒赵岐为自己营造墓葬之事:“(岐)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礼、子产、宴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春秋时期四位名士的画像居墓室宾位,赵岐的画像居墓室主位,仿佛墓主赵岐正在房间中接待前来做客的名士。郑君先生研究认为,赵岐曾遭党锢迫害,他将自己与古代名士的画像并列,或为表明自己的志向不合俗流。

赵岐墓的主位与宾位在墓室何处,我们不得而知。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墓室结构虽较特殊,但仍能找到相似的墓例:位于洛阳的曹魏正始八年墓是一座“前堂后室”的砖室墓,前堂两侧又各开一耳室。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前室与中室之间未设门扉,或可统一视作“前堂”,如此,前贺庄画像石墓的墓室结构便与正始八年

墓近似。李梅田先生研究认为,正始八年墓“前堂”后部发现的铁帐钩可复原为一具精致的帷帐,而同出的铜博山炉、灯碗、玉杯等构成了祭祀空间。前贺庄画像石墓中室的位置恰好对应正始八年墓的“前堂”后部,可能是祭祀空间,中室画像的刻意翻修便服务于祭祀空间的营造,新刻的三男子画像处于宾位。

前贺庄画像石墓因被盗严重而未见标明墓主身份的遗存。翻阅史籍,能够发现《晋书·虞溥传》载:“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专心坟籍……稍迁公车司马令,除鄱阳内史。大修庠序,广招学徒,移告属县曰:‘学所以定情理性而积众善者也。情定于内而行成于外,积善于心而名显于教,故中人之性随教而移,善积则习与性成。唐虞之对,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废也,而云可诛,岂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汉氏失德,天下分崩,江表寇乱,久替王教,庠序之训,废而莫修。今四海一统,万里同轨,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广开学业,以赞协时雍,光扬盛化。’乃具为条制……注《春秋》经、传,撰《江表传》及文章诗赋数十篇。卒于洛,时年六十二。”

虞溥是西晋复兴儒学的重要人物,大力倡导学习礼仪经典。汉晋高官死后一般归葬故里,并由朝廷安排丧事,如《后汉书·伏隆传》载:“诏隆中弟咸收隆丧,赐给棺敛。太中大夫护送丧事,昭告琅琊作家。”虞溥的故乡昌邑城址紧邻前贺庄画像石墓,该墓随葬的牛车、侍俑、武士俑、镇墓兽也与洛阳西晋墓同类随葬陶器近似,这些象征“出行仪仗”的陶器可能是归葬时从洛阳带回。因此,该墓的墓主可能是虞溥,他以“复古”为理念营造墓室,新刻人物画像,既能标榜自己的儒士身份,也可致敬百年前的汉儒赵岐。